



中共發動珍寶島事件的 潛因探討

作者簡介



潘進章備役上校，政校66年班政治系、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三軍大學戰爭學院85年班；曾任總政戰部政參官、國防大學教官、副講座、講座，現任國防大學兼任教師。

提要>>>

- 一、1969年珍寶島事件，中共稱之為「珍寶島自衛反擊戰」。中共對外用兵，均宣稱為了維護國家領土主權或反侵略的自衛反擊戰。
- 二、珍寶島事件，中共內部正進行文化大革命，造成社會的動盪不安與民怨，其為緩和內部危機，轉而對外用兵擴大邊境糾紛。
- 三、美國身陷越戰泥淖，必須尋求外在力量解套，於是開啟了與中共合作大門，直接影響到中共對珍寶島用兵之決策。
- 四、中共迄今仍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故共軍用兵決策仍然由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所掌控。
- 五、中共一向主張「不打沒把握的仗」，珍寶島事件其在軍事上與外交上均作充分的準備，這是中共在用兵決策上的特點，值得我方警惕與重視。

關鍵詞：中共用兵決策、珍寶島事件、自衛反擊、戰略文化

前言

1969年珍寶島事件，是中共繼「1950～53年抗美援朝」、「1958年823臺海戰役」、「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後的主要對外用兵，中共官方稱之為「珍寶島自衛反擊戰」¹。事實上中共對外用兵，均宣稱為了維護國家領土主權或反侵略的自衛反擊戰。珍寶島事件的對象是當時共產社會的蘇聯，就整體實力對比上，中共顯然不如蘇聯，但中共為何還要「自衛反擊」？如同「抗美援朝」的對象美國是當時民主陣營的領導者，而且中共國力遠不如美國，中共為何還要派遣援朝「志願軍」與美軍對抗？可見中共用兵決策模式，有其獨特之處，值得探究。

美國智庫蘭德（RAND）公司研究指出：「1969年中共決定在中蘇邊界挑起緊張關係，在珍寶島引發雙方的重大衝突。中共顯然想先發制人，對蘇聯施加壓力；中共可能認為若其舉止流於被動，將會引誘蘇聯駐守在1960年代中期所劃定的中蘇邊界附近的部隊對中共進行政治勒索。造成中共作此決定的直接原因，可能是蘇聯於1968年8月入侵捷克一事。此事件凸顯了蘇聯勢力擴大所構成的危險，中共可能因而認為有必要讓蘇聯知道中共不是好欺侮的²。」珍寶島事件原因，除了中共與蘇聯領土主權爭奪外，也隱含雙方展開意識形態路線之爭、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轉移，以及開啟美國與中共的關係改變等。

為因應兩岸關係之發展，以及維護我國國防安全，中共對珍寶島之用兵決策模式，值得我方警惕與探究。

珍寶島事件概述

珍寶島事件，由於戰爭對象是政治軍事實力強大的前蘇聯，對中共而言，這不僅是領土主權的爭奪與意識形態的鬥爭，也是轉移內部矛盾的契機，更是爭取國際支持與同情的最佳時機。有關珍寶島事件發展過程分析如下：

一、珍寶島事件前概況

珍寶島是中共黑龍江省與蘇聯遠東地區「界河」烏蘇里江上的一個小島，長約1,500公尺到1,800公尺，寬約600公尺到700公尺，面積約0.74平方公里。烏蘇里江退潮時，珍寶島整個變成一個半島，明顯屬於中國。按照國際法以及中俄之間簽署的條約，國界應以河流主航道劃分，但沙俄利用清帝國的衰弱，占據了烏蘇里江的大部分；這種狀況一直保持到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共建政之後。50年代末，兩國、兩黨出現分歧和矛盾，領土問題就成為影響中蘇關係的重大因素³。珍寶島北端與中國大陸相聯，屬於黑龍江省虎林縣（今虎林市）境內，由於江水冲刷1915年才形成小島，因它兩頭尖，中間寬，形似古代的元寶，故得名珍寶島，俄國人稱之為「達曼斯基」（Damanskiy）島。雙方都宣稱擁有該島主權，加上烏蘇里江經常改變水道，位於其間小島的歸屬權，常隨河

1 參閱《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第二版）》（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7年7月），頁886。

2 艾布蘭·夏爾斯基（Abram N. Shulsky）著，高一中譯，《嚇阻理論與中共的行為》（DETERRENCE THEORY AND CHINESE BEHAVIOR）（臺北：國防部史編局，民國90年11月），頁14。

3 〈珍寶島事件揭秘〉，<http://paper.wenweipo.com/2009/04/11/WY0904110001.htm>



道變化引起雙方爭執，為中蘇埋下衝突因素⁴。

中蘇在黑龍江和烏蘇里江一帶的邊界，是由《中俄璦琿條約》、《中俄天津條約》和《中俄北京條約》所規定的。這幾條條約，是沙俄政府與中國滿清政府所簽訂的條約⁵。根據1860年清朝政府和沙俄簽署的《中俄北京條約》，中俄以烏蘇里江為界。由於珍寶島位於界河之上，歸屬上也沒有定論，中國和蘇聯都曾聲稱擁有該島主權。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八月風暴行動之後，從1947年蘇聯紅軍開始在此巡邏⁶，這也是蘇聯自稱擁有主權的實際行動。

1957年蘇共二十大之後，中共與蘇聯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已經顯露；60年代初，雙方矛盾加深且日益表面化，蘇聯催逼債務、撤走支援中共專家，使中共陷入困難；到1964年，雙方關係全面惡化，並召回大使，致使邊境地區成為雙方宣洩不滿的平臺。1960年代裡，中共政府指責蘇聯侵入中國領土等行徑，而蘇聯也指責中共挑起衝突。從1967年到1969年間，雙方之間的邊境衝突不斷。在整個1960、1970年代裡，彼此論戰和相互指責成為政治生活中的慣常。雙方都在邊界囤積重兵；兩國學者配合形勢，在政治、意識形態領域長期論辯。蘇聯學者認為，1969年是中共「文革」的第四年，中共國內經濟崩潰，

文化、科技衰退，迫使中共政府急於轉移視線，將一切問題歸咎於蘇聯侵略者；而蘇聯領導人似乎也有類似需求，因而衝突對雙方都有「好處」；毛澤東想讓中國人相信：國家處於被包圍的狀態，必須「勒緊腰帶」；而蘇聯政府則想向全世界展示中共政策的「侵略性」⁷，故雙方不斷相互攻訐，衝突一觸即發。

自20世紀60年代中共與蘇聯兩國關係惡化後，雙方邊界開始步入多事之秋。1967年1月至1969年2月，蘇軍先後16次入侵珍寶島，干涉中國居民的正常通行和生產活動，阻止中共邊防部隊執行正常巡邏勤務，打傷中國邊民和邊防戰士多人。對於蘇軍的多次挑釁，中共一再嚴正要求蘇聯停止武裝入侵活動，蘇聯卻置若罔聞⁸。1959年美蘇大衛營會談以及蘇聯開始以經援和軍援支持印度反華以後，蘇聯與中共關係日趨惡化，中共戰略部署的重點也由東南沿海轉向三北（東北、西北、華北）⁹，最後終於在1969年3月2日爆發珍寶島邊境衝突。

二、珍寶島事件戰況

1969年3月2日蘇聯邊防軍出動70餘人，分乘4輛軍車，從下米海洛夫卡和庫列比亞克依內兩個方向入侵珍寶島，對中共邊防戰士進行突然襲擊。中共邊防部隊「被迫」進行自衛反擊，將入侵的蘇軍擊退。3月15日蘇聯先後3次出動50餘輛坦

4 〈珍寶島事件〉，<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zhuant/208158.htm>

5 盧子健，《中國對外關係轉變》（香港：金陵出版社，1985年9月），頁27。

6 〈珍寶島事件〉，<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F%8D%E5%AE%9D%E5%B2%9B>

7 〈披露珍寶島事件的真相與迷霧〉，<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9/1/5/5/100915531.html>

8 劉成軍、劉源，《新中國國防和軍隊6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頁49。

9 王普豐（編），《毛澤東軍事戰略教程》（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9年12月），頁174。

克、裝甲軍和步兵200餘人，在直升機和砲火支援下向中共守島分隊發動猛烈進攻，並砲擊中共縱深地區。中共邊防部隊「英勇」抗擊9個小時，頂住了6次砲火襲擊，挫敗其進攻。17日蘇軍又出動步兵70餘人，在坦克支援下入侵珍寶島，中共邊防部隊再以砲火將其擊退¹⁰。其中3月15日的戰鬥，蘇軍被擊斃近60人，打傷80多人；共軍被擊斃12人，打傷27人。經3月2、15、17日的戰鬥，共軍總共擊毀蘇軍坦克、裝甲車17輛。據蘇方統計，蘇軍在衝突中死58人，傷94人。蘇軍進攻被擊退後，也就沒有再登上珍寶島，中共邊防軍則在島上只留了少量部隊¹¹，自此珍寶島已由中共實際占領。

三、珍寶島事件結果與影響

珍寶島邊界戰爭之後，雙方邊境衝突並未結束。1969年8月在新疆裕民縣巴而魯克山西部的鐵列克提地區，爆發了嚴重流血衝突。蘇聯藉製造衝突來施壓中共妥協，回到談判桌前。珍寶島事件及新疆邊境的衝突，使兩國領導人較為清醒，明白空前緊張關係可能帶來的巨大危險。兩國從此對本身的行為和言論有了一定的節制¹²。1969年9月11日蘇聯總理柯錫金從越南河內參加胡志明葬禮後，在北京機場與中共總理周恩來舉行政府間談判，之後，事態逐漸好轉，流血衝突才算告終。雙方商定，保持邊界的現狀。有蘇

聯評論者認為，此後，珍寶島事實上已經屬於中國的¹³。

1969年中蘇邊境武裝衝突爆發，雙方軍事對峙事實上已逐步升級。中共中央軍委有鑒於蘇軍大規模坦克攻勢構成了主要威脅，要求共軍作戰部隊大力加強反坦克能力，作為挫敗在轟炸機、強擊機和武裝直升機支持下的第一波蘇聯坦克集群攻勢的最有效方式。中央軍委也沒有忽視蘇軍對中共戰略目標實施核打擊的可能。此後20年，共軍一直以「打坦克、打飛機、打空降」（三打）和「防原子、防化學、防生物武器」（三防）為目標，研製相應的武器系統和組織部隊的實戰訓練¹⁴。由此看來，珍寶島事件，帶給共軍戰略戰術的精進與挑戰。

珍寶島事件 中共用兵徵候分析

珍寶島事件，中共用兵徵候是有跡可循的，尤其在政治上中共與蘇聯在意識形態爆發路線之爭；在外交上美國外交政策的改變，直接影響到了中共用兵的決策；在軍事上中共強化三北地區的部署，就是中共用兵的徵候。有關珍寶島事件中共用兵徵候分析如下：

一、政治方面

毛澤東多年來一直認為，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蘇聯而不是美國。中國有一句諺

10 同註1。

11 何明、羅鋒，《中蘇關係重大事件述實（修訂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頁393、394。

12 同註5，頁19。

13 同註7。

14 約翰W.劉易士、薛理泰（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著，薛理泰譯，《中國軍事決策機制及臺海衝突》（Imagined Enemies：China prepares for Uncertain War）（香港：明鏡出版社，2007年8月），頁63。



語：「不怕南面虎，要防北極熊。」毛澤東認為美國在越南已經碰了釘子，將不可能給中共造成麻煩。與此同時，蘇聯的對外政策應驗了毛澤東已隱藏10年的不祥之念。1968年8月莫斯科向布拉格出動了坦克，以結束捷克的抗暴。毛澤東於是把蘇聯的布里茲涅夫（總書記）和柯錫金（總理）稱之為「新沙皇」¹⁵。由此觀之，中共有鑒於蘇聯在政治上強力的干預共產集團的內政，使得中共有所警惕，因而強化了三北地區的部署，可見中共用兵徵候是有跡可循。

由於中共與蘇聯交惡後，對領土爭議相互放話時有所聞。1964年9月15日黑魯雪夫（N.S.Khrushchev）發表「有關領土的談話」，指責中共在現代毀滅性武器充斥之條件下擴大生存空間是相當危險的，並辯稱：在帝制時代的中國，同樣進行侵略掠奪，侵占了朝鮮，奪取蒙古、西藏、新疆等地，所以沙皇和中國帝王一樣，只是「強者掠奪的多一點，弱者掠奪的少一點」而已¹⁶。由此看來，蘇聯領導人對於「領土」的維護與堅持，也是不遺餘力的。1964年10月14日黑魯雪夫被解除黨及政府的一切職務，由布里茲涅夫繼任，其上臺後變本加厲，還干涉共產國家的內政，更引發中共的疑慮與不滿。1964年10月16日中共成功的試爆了

第一顆原子彈，加強了中共對抗蘇聯的信心，也堅定「珍寶島自衛反擊戰」的成功公算。

1969年3月4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指出：中國的安全面臨著威脅……中國的領土主權絕不允許任何人侵犯，如果蘇聯繼續進行軍事挑釁，就一定要受到嚴厲的懲罰，不管蘇聯來多少人，我們都要把他們「堅決、徹底、乾淨地全部消滅」；毛澤東也指出：我們從精神上、物質上都要準備打仗，要準備打大仗、打硬仗、打惡仗。這沒有什麼了不起，地球還是照轉，無非是中國人死一半，但中國是消滅不了的¹⁷。由上述中共領導人在政治上發言的堅硬態度，可見其堅定珍寶島用兵的決心。

二、外交方面

中共建國初期毛澤東說，當今之世，非白即墨，不是倒向蘇聯一邊，便是倒向美國一邊。我們在國際上是屬於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的，真正的友誼援助只能向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去找。實現「一邊倒」核心問題之一是中蘇間須廢除舊約簽訂新約，是為奉行「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的戰略，同蘇聯簽訂新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結為盟友¹⁸。由此觀之，中共建政初期對蘇聯是有所期待的。但自黑

15 Ross Terrill 著，胡為雄、鄭玉臣譯，《毛澤東傳》（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7月），頁409。

16 黃錦彬，《中（共）蘇邊界糾紛之研究——新疆地區之戰略對抗》（臺北：政戰學校政研所碩士論文，民國73年6月），頁86、87。

17 同註11，頁394、395。

18 〈三大決策：新中國的開國外交壯舉〉，<http://blog.chinamil.com.cn/user1/tangjiapeng/archives/2009/559687.html>

魯雪夫上臺以後，雙方對共產黨的路線產生爭議，再加上布里茲涅夫上臺後，宣布實施「布里茲涅夫主義」（Brezhnev Doctrine），即蘇聯認為當社會主義道路處於危險之際，它有權採取行動以干涉任何共黨國家之內政。因而引發中蘇雙方在外交上的衝突，其他共產國家也只有冷眼旁觀，導致珍寶島事件之外交斡旋與折衝，少了緩衝閥，雙方爆發衝突跡象已極為明顯。

中蘇對抗迫使中共的外交路線急劇轉變，中共轉而尋求新的戰略盟友，與美國修好（其時，美國在越南深陷泥淖，開始收縮；與中共改善關係，可以幫助美國從越南體面地撤出，結束噩夢），中共、美國、蘇聯戰略大三角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¹⁹。由此觀之，基於國家利益與大戰略的考量，中共與美國停止了外交上的爭議，進一步的接觸與交往。珍寶島事件，就在此背景下進行，也使中共在用兵決策上，有了更多的籌碼。

針對珍寶島事件，蘇聯外長葛羅米柯從維護蘇聯國家利益出發，站在戰略高度分析當時的形勢，他說：「我們這樣做最大的損失並不在於同中國關係惡化，而在於把中國推向美國一邊，使美國的勢力強大起來，現在蘇美關係正處於一個交叉路口，誰得到更多的國際力量支援，誰就會占優勢，我們一旦抓不住這個機會，使美國在外交上占主動，那麼，整個20世紀70

年代仍是美國獨霸天下的時代²⁰。」上述觀點反映出，中共與蘇聯缺少了外交斡旋與折衝，導致珍寶島邊界戰爭的爆發，使美國有可乘之機，也開啟了美國「聯中制俄」的戰略。

三、軍事方面

從1965年至1969年，中共空軍先後有26個高砲團、9個探照燈營、14個雷達連進入越南作戰；陸軍先後有37個野戰高砲團進入越南作戰。這批高砲部隊為數眾多，又富於實戰經驗，調回國內以後，必然會強化三北地區（東北、西北、華北）的防空力量。從另一個層面考量，中共陸、空軍將入越作戰的全部高砲部隊從「反美前線」調回國內以防備蘇聯空襲的決定，反映了中共領導層對於來自境外的最主要的、最現實的軍事威脅的認知²¹。當中共完成對蘇聯的軍事部署後，其領導階層的用兵決策是堅定而且是明快的，由此跡象顯示，中共已決心與蘇聯爭奪珍寶島領土主權。

珍寶島事件當時的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回憶說：這次珍寶島自衛反擊戰確實是經過中央批准，早有準備的。當時正準備開九大，大軍區首長均來到北京，因此，中央軍委專門在京西賓館開設一個房間，架設了專線，由他負責直接與前線聯繫，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負責掌握國際方面的情報，隨時向周恩來彙報，並由周恩來（毛澤東授權）下最後決心。為了最初

19 艾君，〈珍寶島事件的真相與迷霧〉，<http://magazine.sina.com/nfcmag/000/2009-03-15/222414011.shtm>

20 〈破解「珍寶島事件」外交僵局的關鍵人物〉，<http://books.sina.com/artbook/exposure/2009-05-19/ba18952.shtml>

21 同註14，頁88。



的戰鬥，我們準備兩三個月的時間，從3個軍抽調了3個偵察連，每個連二三百人，由有作戰經驗的參謀人員帶隊，進行專門的訓練和配備，打得乾淨俐落²²。由此可見，中共的調兵遣將極為周全，用兵跡象也非常明確。

綜合上述可見，珍寶島事件，中共與蘇聯用兵決策之徵候包括：在政治方面，政治意識形態爭議已不可收拾；在外交方面，主要是尋求國際支持與同情，進而打擊對方外交之助力；在軍事方面，加強邊

界軍力部署，俟機發動攻擊，奪取領土主權（如表一）。

珍寶島事件中共用兵決策因素分析

珍寶島事件，對中共而言，除了爭取領土主權外，也正值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共為緩和內部危機，轉而擴大邊境糾紛。蘇共二十大之後，中共與蘇聯已爆發意識形態之爭，再加上美國在越戰深陷泥淖，急欲藉中共與蘇聯的矛盾，拉攏

表一 珍寶島事件中蘇雙方用兵決策之徵候與作為

國 別	類 別	用 兵 決 策 之 徵 候 與 作 為
蘇 聯	政 治	1. 1957年蘇共二十大之後，中共與蘇聯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已經顯露；60年代初，雙方矛盾加深且日益表面化。 2. 蘇聯藉挑起邊界衝突，轉移人民對其國內政權的不滿（如1969年1月22日克里姆林宮之槍殺事件）。 3. 1969年6月將召開國際共黨大會，蘇聯希藉由「珍寶島事件」，證明中共是好戰國家，並爭取歐洲共黨國家支持，將中共趕出國際共黨大會。 4. 利用「珍寶島事件」，說服其國內及國際共黨分子，指控中共不僅是激進派分子，也和美帝國主義進行勾搭。
	外 交	1. 利用「珍寶島事件」，轉移東西德「西柏林」通路爭議問題。 2. 利用「珍寶島事件」，轉移蘇聯領導階層對捷克、柏林、史達林等的爭議，集中力量應付中共。 3. 利用「珍寶島事件」，爭取國際支持與同情，轉移世人對其入侵捷克之不良印象。 4. 利用「珍寶島事件」，間接干預中共與美洲、歐洲非共產國家之和解（加拿大、西德、義大利、比利時在1968年先後與中共建交）。
	軍 事	1. 蘇聯鷹派之政客與將領，主張以突擊方式，解決「中國問題」，或製造藉口摧毀中共核子裝備，推翻毛政權。 2. 利用「珍寶島事件」，博取反中共國家的支持，尤其與中共有領土糾紛的國家（如印度）。 3. 利用「珍寶島事件」，鼓勵中共反毛勢力，聯合親俄分子俟機向毛奪權。 4. 利用「珍寶島事件」，再度燃起俄人仇華情緒，趁機奪取爭議邊界土地。

22 〈史海：珍寶島事件的發生促進中美關係解凍〉，http://big5.ce.cn/culture/history/200811/12/t20081112_17357205.shtml

中共	政治	1.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在意識形態宣傳上既「反帝」、「反資」也「反修」，並以「反修」為主。 2.中共召開「九大」的目的：阻止反對派走蘇聯修正主義路線。藉珍寶島事件，把反對蘇修變成反對新沙皇，反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 3.利用「珍寶島事件」，藉機煽動國內外反俄情緒。 4.與俄之領土爭議，正符合中共內部心理及政治需要。有利於國內之團結，且使邊疆之鞏固工作易於進行。
	外交	1. 1967年尼克森在《外交季刊》發表《越戰之後的亞洲》一文，提出：「從長遠的觀點看，我們負擔不起永遠把中國留在各國大家庭之外。」毛澤東判斷出，如果尼克森上臺，美國有可能改變對華政策，使中共珍寶島用兵決策，更具彈性。 2.利用「珍寶島事件」，以受害者身分，爭取國際社會與反蘇國家的同情或支持。
	軍事	1.1968年8月蘇聯鎮壓捷克後，深怕蘇聯利用文革混亂情勢將矛頭指向中共，於是加強邊防。 2.中共期望藉「珍寶島事件」，制止蘇聯在新疆之軍事與顛覆陰謀活動。 3.中共先後調回進入越南作戰的防空部隊，加強了三北地區（東北、西北、華北）的防空力量，使得中共珍寶島用兵決策更堅定。

資料來源：一、唐仁俊，〈中共對領土主權處理模式之分析——以韓戰、中（共）、印、蘇、越戰為例〉《國防雜誌》（桃園），第16卷第6期，民國89年12月，頁57、58。
 二、唐洲雁，〈新中國如何確立「聯美抗蘇」〉，<http://dangshi.people.com.cn/BIG5/85039/9330460.html>
 三、〈披露珍寶島事件的真相與迷霧〉，<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9/1/5/5/100915531.html>
 四、章孝嚴，〈珍寶島事件及匪俄關係〉（臺北：黎明公司，民國67年4月），頁87～93。
 五、約翰W.劉易士、薛理泰（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著，薛理泰譯，〈中國軍事決策機制及臺海衝突〉（Imagined Enemies：China prepares for Uncertain War）（香港：明鏡出版社，2007年8月），頁88。
 六、作者整理。

中共，企圖改變國際戰略態勢，達成「一石兩鳥」之利。有關中共的用兵決策分析如下：

一、國內因素

1969年中蘇珍寶島事件，中共內部正發生文化大革命，造成民間的反毛反共運動，一天比一天嚴重，中共為將內部危機緩和下去，轉移人們的視線，就轉而擴大邊境糾紛。在此期間，中共也正在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大會，中共想藉由珍寶島事件，掀起一個反俄高潮。召開「九大」

的目的：是要徹底地擊潰共產黨內的反對派，進而阻止反對派走蘇聯修正主義路線。當時「反對蘇修」和「反對美帝」並列為中共的對外總路線，但要改變一般黨員的舊有思想，並非易事。因此，將這次的邊界（珍寶島）問題擴大宣傳，造成反俄風潮。以當時中共的狀況來看，在各方面皆處於劣勢，而蘇聯當時是世界兩強之一，其國防力量遠遠的超過中共。但雖如此，中共仍在珍寶島的邊界衝突中，不惜與蘇聯發生武力衝突，以保持領土主權的



完整性²³，並藉此轉移國人對「文化大革命」不滿的焦點。

另一方面，毛澤東「三面紅旗」²⁴失敗後，迫使毛澤東把黨政日常工作交由劉少奇、鄧小平等人負責，退居二線。毛澤東對這一批「修正主義」的官僚精英掌握了大部分的權力，極度不安。從1964年到1969年，國內外的嚴峻形勢挑戰，他的「黑魯雪夫式」的敵人在莫斯科和北京都存在，在這兩處的敵人即使不是同謀，至少也是在思想上相互呼應的²⁵。針對上述情勢發展，毛澤東不惜發動珍寶島邊界戰爭，趁勢鞏固其統治地位，防止國內「修正主義」者趁機奪權，故實際上也隱含了國內政治鬥爭。

二、蘇聯因素

中共革命一開始一直把蘇聯當作社會主義的模範，當作朋友、老大哥，甚至當作領導者，但在60年代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蘇聯自黑魯雪夫上臺以後，在黨的二十大推出秘密報告，大反史達林，引起國際共黨成員的不同看法。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認為，對史達林應該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不贊成全盤否定的做法。中蘇兩黨從此開始了分歧，嗣後，毛澤東斷然拒絕了黑魯雪夫關於建立共同

艦隊和長波電臺的意見。黑魯雪夫接著以撕毀經濟合同、撤走專家，還把韓戰的軍火支援催逼中共還債等壓迫中共²⁶，自此雙方埋下珍寶島邊界戰爭的種子。

1966年3月中共中央決定不派代表團參加蘇共二十三大，兩黨關係隨之中斷。布里茲涅夫上臺後，繼續向中蘇邊界增兵，由黑魯雪夫時期的10個師，增加到54個師，達100多萬人。1966年1月蘇聯同外蒙古簽訂帶有軍事同盟性質的《蘇蒙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並派軍進駐蒙古。同時，蘇方還在中蘇邊界多次舉行有針對性的軍事演習，並在遠東配備了可以進行核攻擊的數百架轟炸機。從1964年10月15日到1969年3月15日以前，蘇聯方面挑起的邊境事件竟達4,189起之多，比1960年到1964年期間蘇聯方面挑起的邊境事件增加了一倍半²⁷，最終導致了珍寶島邊界戰爭的發生。

三、美國因素

1968年8月蘇聯入侵捷克，毛澤東擔心莫斯科力量日益強大，終有一天會想主宰中國，加上毛澤東看出美國準備從越南脫身，於是他也考慮與美國這個超級大國修好，以制衡日益增強的蘇聯壓力²⁸。由於美國深陷越戰泥淖，極欲擺脫困境，

23 〈1969年珍寶島事件〉，<http://www.scu.edu.tw/politics/member/lowwww/reports/cfp/conflict.htm>

24 三面紅旗分別是「總路線」、「大躍進」及「人民公社」，企圖在短期內使中國成為一個富強的國家，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三面紅旗最後以慘敗收場，迫使毛澤東把黨政日常工作交由劉少奇、鄧小平等人負責，退居二線。

25 同註14，頁71、72。

26 同註9，頁182。

27 同註11，頁385、386。

28 於下頁。

1969年1月20日尼克森上臺後，面臨每年有1萬5千名子弟傷亡²⁹，尼克森深信對中共新政策是美國新外交政策中必要成份，他明白雙方思想和政治的歧異，以及有待克服的敵意與猜疑。但他亦深信，美國已不再可能與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切斷關係³⁰。於是打算暗中拉攏中共藉以解決越戰困境，以及分化共產世界。尤其中共與蘇聯刻正水火不容，美國與中共也各自盤算，希能從中獲取政治利益。因此美國態度就成為中共珍寶島用兵決策的重要考慮因素。

美國1969年還認為，中共是中、蘇兩敵之中，更有敵意及威脅性的一國；甘迺迪及詹森執政時期，美國官員有時候還談到要聯合蘇聯來對付中共。而尼克森則意在打破上述所有桎梏，創造一個使美國外交政策更具彈性的環境，並且強化尼克森的政治資本³¹。1969年1月20日尼克森在總統就職演說中，有意識地表達了緩和對中共關係的主張：「我們謀求建立一個開放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大小國家的人民都不會怒氣沖沖地處於與世隔絕的地位。」同年3月初，在同法國總統戴高樂

的會談中，尼克森又提出：考慮到將來，在我和蘇聯進行對話時，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國問題上為自己找個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珍寶島事件前後，美國遞來的這些橄欖枝，堅定了毛澤東調整對美關係的想法³²。

針對中共與蘇聯的緊張關係，季辛吉認為，整個冷戰世代被視為堅若磐石的共產主義陣營，也出現嚴重縫隙，使得美國外交亦出現新機會。黑魯雪夫1956年揭露史達林統治的殘暴不仁，蘇聯1968年入侵捷克，都挫弱了共產主義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中共和蘇聯的分裂更破壞莫斯科硬充是統一的共黨運動首領之假象。所有這些發展都顯示，有相當空間可供新的外交彈性轉圜運作³³。由此看來，尼克森政府對華政策的改變與運用，使得中共對珍寶島用兵決策與爾後發展，更具彈性與信心。

珍寶島事件中共用兵決策之評析

該事件中共用兵決策，主要受到中共戰略文化、美國因素等的影響，而且中共

28 Patrick Tyler著，聯合報編譯組譯，《中美交鋒》（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臺北：聯經公司，2000年2月），頁45、46。

29 孟捷慕（James H. Manm）著，林添貴譯，《轉向——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密》（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Clinton）（臺北：先覺公司，1999年7月），頁29。

30 包宗和，《美國對華政策之轉折——尼克森時期之決策過程與背景》（臺北：五南公司，2002年8月），頁33。

31 同註29，頁28。

32 唐洲雁，〈新中國如何確立「聯美抗蘇」〉，<http://dangshi.people.com.cn/BIG5/85039/9330460.html>

33 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著，林添貴、顧淑馨譯，《大外交（下）》（Diplomacy）（臺北：智庫文化公司，1998年1月），頁953。



一向主張不打沒有把握的戰爭，可見其用兵決策有獨特之處。當前中共用兵決策，是否記取經驗教訓而「與時俱進」？上述觀點評析如下：

一、中共戰略文化影響用兵決策

從中共歷史的發展來看，其建政六十餘年來，中共參與所謂「抗美援朝」、「823臺海戰役」、「中印邊界戰爭」、「珍寶島事件」、「懲越戰爭」、「1996年臺海危機」等，均與中共決策者的戰略文化息息相關。戰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一詞，一般認為，首先提出的是史奈德(Jack L. Snyder)於1977年替美國蘭德公司，作有關前蘇聯政軍領導人接受有限核子戰略可能性的報告中所提出³⁴。中共軍科院前副院長李際均指出，重防禦是毛澤東軍事思想批判地繼承了中國傳統的戰略文化，內容強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要別國的一寸土地；也不許別國侵占我國的一寸土地³⁵。」中共認為，在近代史中的鴉片戰爭，中國以「睡獅」被列強蠶食飽受歷史之屈辱，淪為殖民地和割讓領土之痛苦經驗，使中國自然培養出保衛領土和對國家主權的強烈意識³⁶。由此可見，中共決策者對保衛領土與維護國家主權，絕對力爭到底。

珍寶島事件，帶給中共與蘇聯雙方不少損失與傷亡，也引發中共的省思。由於

兵凶戰危，是中國古代戰略文化思考起點，中共也自認為：「在戰略實踐方面，近些年來更有創造性地發展。比如，在與周邊國家解決邊境領土爭端方面，過去長期軍事對峙，甚至不乏動用武力，以至於發生邊境戰爭，然而，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而當我們正確地利用國際形勢發展變化的特點和趨勢，恰當地運用鬥爭手段和方式，情況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儘管我國與多個周邊國家都存有爭端，但未放一槍一彈，卻大多得到和平解決³⁷。」由此觀之，研判未來中共解決領土爭端決策問題，將運用諸般手段予以處理，武力衝突將不再是唯一選項。

二、美國立場影響中共珍寶島用兵決策

珍寶島事件，當時美國的立場與態度對中共極為重要，此時，中共與蘇共為各自堅持的「意識形態」爭論不休，再加上「布里滋涅夫主義」的威脅，中共必須尋求外在力量支持，恰巧美國身陷越戰泥淖，也必須尋求外在力量解套，於是雙方開啟了合作大門。中共與美國關係的改變，將直接影響到中共對外用兵之決策。

美國在亞洲的權力與軍事行動一向被視為與中共改善關係的障礙，尤其中南半島戰爭，更使中共視美國為安全威脅者。結束越戰，適足以減輕中共的疑懼³⁸。因此毛澤東也趁勢利用美國陷入越戰泥淖的困境，擺脫兩面受敵的不利戰略態度，使

34 Jack L. Snyder,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1977), p.9.

35 李際均，《軍事戰略思維》(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2月)，頁241。

36 《中共軍事論》(臺北：國防部史編局，民國84年2月)，頁20。

37 馬保安(編)，《戰略理論學習指南》(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2年4月)，頁18。

38 同註30，頁66、67。

得中共珍寶島邊界戰爭的用兵決策考量，不再孤立無援。

冷戰時期，美國與中共兩國分屬不同陣營，不過，意識形態雖然有所差異，當中共面臨要在蘇聯這個「赤色惡魔」和美國這個「白色惡魔」之間作抉擇時，中共選擇了美國，雙方聯手對抗蘇聯威脅³⁹。中共與蘇聯對抗迫使中共的外交路線必須轉變，中共轉而尋求與美國修好，企圖「拉美打蘇」爭取外交上更多的助益。由此觀之，基於國家利益與大戰略考量，中共與美國暫停了政治、外交、軍事上的對抗。珍寶島事件，就在此背景下進行，也使中共在用兵決策上，有了更多的籌碼。

三、不打沒有把握的戰爭

探究珍寶島事件，發現中共用兵決策，有其特點，值得我方警惕與重視。毛澤東一再強調不打沒有把握的仗，就珍寶島事件言，以當時中共的實力看來，在各方面皆處於劣勢，而蘇聯當時是世界兩強之一，軍事力量遠遠的超過中共。中共之所以能夠擊退蘇軍，最主要是共軍做好萬全準備。不僅由瀋陽軍區從3個野戰軍中挑選了3個加強的偵察連，由具作戰經驗的參謀軍官給予指導；並在靠近珍寶島的邊防站成立臨時指揮所，瀋陽軍區還成立虎（林）饒（河）前線指揮部⁴⁰。在動員方面，黑龍江省等承擔了大量的動員保障任務。在戰爭後期，中共組織20多個

軍工企業緊急研製反坦克武器；物資儲備局為此從國家戰略物資儲備倉庫調撥「專特」物質850噸⁴¹，藉以保障戰爭的後勤支援。

另一方面，在珍寶島戰爭前後，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和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各率領一個小組在北京隨時待命。前者的任務是彙報戰況並且控制戰鬥規模；後者的使命是隨時掌握國際情報並反映來自國外各方面的反應。相比之下，蘇共中央政治局幾個主要成員正在國際訪問，被這場突如其來的衝突搞得不知所措。衝突在1969年3月2日發生，直到3月6日蘇共中央政治局才得以召開緊急會議⁴²。由上述可見，中共的用兵決策與應變作為較為周全，也就是要打一場有準備的戰爭。

四、當前中共用兵決策之研判

就中共的歷史發展經驗，中共用兵決策的核心與機制，從「八一建軍」迄今，並非一致性，中共用兵決策到底是由「黨、政、軍」哪個單位來決定？尤其是「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一直是外界所好奇。在和平時期，黨領導一切，也就是「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但面臨戰爭用兵決策則依領導人的威望有所不同。例如：毛澤東、鄧小平他們權力來源更多是因為魅力型領導人身分。因此，毛鄧縱使不具黨政職務，依然可能成為最高領導人。因此，黨與政的職位只是更增

39 袁鵬，中國人對美國的觀感，卡羅拉·麥克吉福特（Carola McGiffert）編，陳孝燮譯，《美國政治印象中的中國》（China in the America Political imagination）（臺北：國防部史編室，民國94年2月），頁125。

40 同註11，頁388。

41 同註8，頁327、328。

42 同註14，頁84。



加他們運用權力的正當性而已。「黨指揮槍」在很大的程度上則是原則性宣示，而國家機構更不可能指揮軍隊⁴³。1990年代以後，由於中共黨政軍的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並未具有像毛澤東和鄧小平魅力型領導人身分，所以，中共用兵決策核心與機制，勢必重新適應與調整，也就是要靠相關法規與制度。

中共1982年通過的憲法稱，為健全國家體制，增設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規定由它「領導全國武裝力量」，軍委會實行主席負責制，向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負

責，亦即軍委主席應受命於人大委員會。不過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並未取消。這說明了「軍隊國家化」的規定是有名無實的，中共軍隊仍然是置於黨的直接領導下，受黨的控制⁴⁴，「以黨領軍」，仍為中共政權的本質。有關中共相關法規之用兵決策主要內容，詳如表二。

由表二可見，黨章總綱明訂，中國共產黨堅持對人民解放軍和其他人民武裝力量的領導，也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必須置於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其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屬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表二 中共相關法規之用兵決策主要內容

項次	區分	用兵決策主要內容
一	黨章	總綱：中國共產黨堅持對人民解放軍和其他人民武裝力量的領導。
二	憲法	1982年《憲法》序言規定：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第80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公布法律……，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宣布戰爭狀態，發布動員令。
三	國防法	第13條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全國武裝力量，行使下列職權：1.統一指揮全國武裝力量；2.決定軍事戰略和武裝力量的作戰方針……。第19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受中國共產黨領導。武裝力量中的中國共產黨組織，依照中國共產黨章程進行活動。第47條國務院和中央軍事委員會共同領導動員準備和動員實施工作。
四	政工條例	第4條中國人民解放軍必須置於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其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屬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軍事委員會。

資料來源：一、《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部分修改，2007年10月21日通過。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2004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修正。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1997年3月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

四、《政工條例》，中共中央、中央軍委2003年12月修訂頒布。

43 丁樹範，〈1990年代以來的中國黨軍關係〉《中國大陸研究》（臺北），第46卷第2期，民國92年3月，頁58。

44 李谷城，〈中共黨政軍結構〉（臺北：淑馨出版社，1992年7月），頁7。

和中央軍事委員會。由於中共黨的領導，主要是思想領導、組織領導與政治領導，因此黨與國家的中央軍事委員會，自然形成「黨政不分」。可見中共所謂「兩個牌子、一套人馬」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實質上還是由中國共產黨掌控軍隊，也就是說「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仍然是共軍的特色。故其用兵決策核心與機制，是由中共中央與中央軍委負責，其他國家機構只是形式上配合實施而已。

中共歷經多次武裝衝突，戰時黨與軍如何作決策，目前已形成運作模式。一般而言，儘管在處理國家安全問題上，黨的政治局常委會總是非常重視高級將領的意見，然而在決定打仗之前政治局常委會是唯一有權決定國家發展方向和安全、軍事行動的機構。在和平時期，包括涉及武裝威脅和軍事部署的最緊急的危機時刻，政治局常委會擔當國家最高軍事決策機構的使命。但一旦戰爭爆發，身兼軍委主席的黨的主要領導人的領導下，中央軍委即直接地負責全面的軍事行動。軍委主席必須隨時向政治局常委會彙報戰況，並把政治局常委會採納的新政策傳達給中央軍委所屬各部門，以便總參謀部作戰系統採取相應的配合行動⁴⁵。由此看來，當前中共用兵決策，主要掌握在中共中央（含中央委員會及其所屬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與中央軍委（含黨的中央軍委與國家的中央軍委，俗稱「兩個牌子、一套人馬」）。

結 語

珍寶島事件，就整體實力對比上，中共顯然不如蘇聯，但中共為何還要「自衛反擊」，在用兵決策上顯然有其特別考量，尤其面對領土主權問題上，中共一向「寧失千軍」也要維護領土主權的完整，這與其戰略文化息息相關。中共為轉移國內矛盾，對外發動戰爭藉以轉移焦點，也是時有所聞。以珍寶島事件為例，當時正逢中共文化大革命，造成民間的反毛反共運動，毛澤東為緩和內部危機，轉而擴大邊境糾紛，並藉由珍寶島事件，掀起一個反俄高潮，阻止反對派走蘇聯修正主義路線，並藉以轉移國人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

珍寶島事件，中共在用兵決策上，也深受美國立場影響，當時美國在越南深陷泥淖，尼克森政府主動與中共改善關係，希幫助美國從越南撤出以結束噩夢，於是中共、美國、蘇聯戰略大三角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共也借力使力，從中獲取政治外交的利益。目前中共極力推行法制化，在用兵決策上希能「依法行政」，惟中共迄今仍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故共軍用兵決策仍然由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所掌控，與民主國家制度完全不同。再者中共主張「不打沒把握的仗」，因此珍寶島事件在軍事上與外交上均作充分的準備，這也是在用兵決策上的特點，值得我方警惕與重視。

收件：99年3月30日

修正：99年4月14日

接受：99年4月16日

45 同註14，頁234、235。